

第五章 魏晉時代地方史知識的變動與政治社會的關係

由前兩章的分析與討論中可以發現，《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作為吳越古史知識的過程中，魏晉之際是個很顯著的時間分界點。在此之前的《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不過是作為吳越地方史學知識的一部份，在時間的演變中不斷地被當地的文士提煉。然而在魏晉之間，不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終於定型，也成為日後版本的祖本。另外又逐漸流傳到全國而受到重視，成為對於了解吳越古史的重要文獻。不只於此，連撰寫當地歷史的體例在魏晉之間也發生重大轉變，由《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代表的古代地方政權史（國別史）讓渡給魏晉以降的地方志。

為何知識的轉變會發生在這個時期？或許一種知識從創作到流傳的變化，意味著知識本身的成熟以及產生可被利用的價值。在魏晉以後對於《吳越春秋》的改寫，只是就原本的知識基礎上為了適應不同的時代而從事的改寫行為而已，在創新的意義上較為薄弱。且《越絕書》同時出現類似的多種版本，也說明了是在同一種知識體系下的發展。故可以從《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本身提供了魏晉以後時代什麼樣的價值，以及利用《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來進行思考。但這只是舊有知識的複製，舊的知識畢竟有其限度，新的歷史知識還在產生。面對新的知識在新的時代中如何運用新的寫作方式加以處理，又在此中融入舊有知識，這就是本章所要進行的討論。

上一章已可看到，《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流傳時，有著各方面閱讀者的需求。《越絕書》中「絕」的獨特意義被發覺，《吳越春秋》之後也逐漸被認識到有著借鑑的功能，這都是兩書在政治上的意義被突顯。而在魏晉之際，不但是中國政治與社會發生劇變的時期，也是中國史學發展重要轉變的時刻。在政治中進入了長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南方的六個王朝紛紛以古代的吳越地方作為首善之地，建都於此。這是繼春秋時代吳越兩國在此建立霸權之後，第一次有國家以此地作為政權的核心，這不就意味著在政治地理結構上存在著關聯性嗎？此外，促成在兩漢吳越地方史學興起的士人們，在魏晉以後更形成了龐大的豪族勢力，新的史學體裁正是由他們操刀，豪族的發展正是與此時代的地方史學進行互動。

第一節 地方志的湧現

關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種類的多途發展，學界論述已多。而此處所論地方志，指的是劉知幾在《史通·雜述》所稱的郡書和地理書兩種，因為此兩類的寫作有強烈的地域色彩，重視一個地區之內的人物、山川、異物和風俗等，所以此兩類與本文要討論的地方史關係最為密切。

一、吳會地方志概況

因為目前所見的魏晉南北朝地方志都只剩下斷簡殘篇，復原最完整的要算是《華陽國志》，但這不是吳越地方的地方志。因此就目前所見之資料，則必須相當借重《隋書·經籍志·史部》與後來章宗源和姚振宗分別撰寫《隋書經籍志考證》的幫助，以及參考胡寶國與青山氏的分析整理。¹以下分別列出魏晉南北朝吳會地方的郡書和地理書的著作情況：

表 5-1：魏晉南北朝吳會地方郡書表：

時代	作者	出生地（郡望）	作品名稱（別稱）	卷篇數	出處	附註
吳	謝承	會稽山陰謝氏	《會稽先賢傳》	7 卷	《隋志》，975	
	陸凱	吳郡吳縣陸氏	《吳先賢傳》（《吳國先賢傳》）	4 卷	《隋志》，975	
晉	賀氏		《會稽先賢像贊》	5 卷	《隋志》，975	姚《考證》推測為賀循，307
	賀氏		《會稽太守像贊》	2 卷	《唐志》，2001	
	鍾離岫	會稽山陰鍾離氏	《會稽後賢傳記》	2 卷	《隋志》，975	姚《考證》推測為東晉人，會稽山陰鍾離氏，307

¹（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和（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2 月）。又關於郡書的分析，胡寶國〈雜傳與人物品評〉已有做過時代的分析，以下將有所借用。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1 月），頁 132-158。另外青山定雄也對其所收集的地方志資料進行考證，〈六朝時代の地方誌について——撰者とその内容——〉，《東方學報（東京）》12 冊之 3、13 冊之 1，頁 342-356，51-81。

	虞預	會稽餘姚虞氏	《會稽典錄》	24 卷	《隋志》，975	
齊	孔道	會稽山陰孔氏	《三吳決錄》		《南史》，1770	
梁	吳均	吳興故鄣	《錢唐先賢傳》（《吳都錢塘先賢傳》）	5 卷	《梁書》，699	

表 5-2：魏晉南北朝吳會地方地理書表：

時代	作者	出生地（郡望）	作品名稱（別稱）	卷篇數	出處	附註
東漢	楊孚		《臨海水土記》		姚《後漢志》，73	姚《後漢志》對此感到懷疑，因臨海郡立於吳太平二年。
吳	顧啓期	吳郡吳縣顧氏	《婁地記》	1 卷	《隋志》，982	
	朱育	山陰	《會稽土地記》（《會稽記》）	1 卷	《隋志》，983	
			《吳都記》		劉《輯佚》，52-53	
	環氏		《吳地記》		張《方志》，200	張《方志》氏疑為晉環濟
	顧微	吳郡吳縣顧氏	《吳縣記》		章《考證》，38	
	韋昭	吳郡	《吳興錄》		顧《後漢志》，78	
	韋昭	吳郡	《三吳郡國志》		章《考證》，39	
	沈瑩	吳郡吳康沈氏	《臨海水土物志》（《臨海水土異物志》、《臨海異物志》、《臨海水土志》）	1 卷	《隋志》，984	姚《考證》推測為吳郡吳康沈氏，364
			《吳記》		劉《輯佚》，98	劉《輯佚》推測可能為他書省稱
晉	周處	義興陽羨周氏	《風土記》		《隋志》，982	
	孔曄		《會稽記》		章《考證》，39	青山氏推測為吳晉時的作品，54
			《分吳會丹陽三郡記》（《吳會分地記》、《吳會野記》）		《唐志》，2014	

	顧夷	吳郡吳縣顧氏	《吳郡記》(《吳地記》)	1 卷	《隋志》，982	
			《永世記》		劉《輯佚》，100	劉氏認為晉或宋初
	顧長生		《三吳土地記》(《三吳記》)		文《晉志》，36	
	張玄之	吳郡	《吳興山墟名》		章《考證》，38 ²	
	賀循	會稽山陰賀氏	《會稽記》	1 卷	《隋志》，982	
			《吳郡緣海四縣記》(《吳郡緣海記》)		章《考證》，39	青山〈地方誌〉推測為東晉作品，348
宋	劉損	沛郡蕭縣	《京口記》	2 卷	《隋志》，982	
	山謙之		《南徐州記》	2 卷	《隋志》，983	
	董覽		《吳地記》(《吳地志》)		章《考證》，38	
	王僧虔	琅琊臨沂	《吳郡地理記》(《吳郡地理志》、《吳地記》)		章《考證》，39	
	劉澄之	宗室、彭城	《揚州記》		姚《考證》，359	姚《考證》疑為《永初山川古今記》之一卷
	山謙之		《丹陽記》		章《考證》，47-48	
	吳穆之		《義興記》		劉《輯佚》，181	劉《輯佚》認為晉宋之作
			《會稽郡十城志》		章《考證》，40	劉《輯佚》認為宋代之作，182
	孔靈符	會稽山陰孔氏	《會稽記》		章《考證》，39	章《考證》認為孔曄與孔靈符為同一人。 ³

²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中原為張充之，但根據（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12 月），卷 4〈安吉州碑記〉，「《吳興山墟名》，張元之撰。」頁 28。而《晉書》卷 79〈謝安傳〉附奕子〈謝玄傳〉則提到，「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頁 2085。因「充」、「元」、「玄」三字相近，或為筆誤，今姑且從為張玄之。

³ 青山定雄指出在《藝文類聚》中，孔靈符《會稽記》和孔臯《會稽記》同時徵引，其中孔臯為孔曄之誤，故可能同時存在孔靈符《會稽記》和孔曄《會稽記》。因此否定了章宗源認為兩書同為一書的說法。青山定雄，〈六朝時代の地方誌について（承

	王韶之		《吳興郡疏》	1 卷	張《方志》，320	張《方志》以爲晉宋間人，宋文帝時任吳興太守
	山謙之		《吳興記》	3 卷	《隋志》，982	
	謝靈運	陳郡陽夏謝氏	《永嘉記》		劉《輯佚》，191	
宋	鄭緝之		《永嘉記》（《永嘉郡記》、《永嘉地記》）		章《考證》，50	
	鄭緝之		《東陽記》	1 卷	《唐志》，2014	
	劉道真		《錢塘記》		章《考證》，49	
	孫詵	太原中都	《臨海記》		劉《輯佚》，201	
齊	陸道瞻		《吳地記》（《吳郡記》）		《通志》，1578	
	虞願	會稽餘姚虞氏	《會稽記》		《南齊書》，917	
梁	陶季直	丹陽秣陵	《京邦記》（《京國記》、《京都記》）	2 卷	《新唐志》，1504	
陳	姚察	吳興武康姚氏	《建康記》	1 卷	徐《補南北志》，18	
不確定			《建康宮殿簿》（《建康宮闕簿》）		章《考證》，37	劉《輯佚》推測爲陳朝作品，317
	陳暄		《國山記》		劉《輯佚》，319	劉《輯佚》推測爲南朝作品
	是乘民		《江乘地記》（《江乘記》）		章《考證》，51	劉《輯佚》推測爲南朝作品，320
	夏侯曾先		《會稽地志》（《會稽志》、《會稽記》）		劉《輯佚》，321	劉《輯佚》推測爲陳隋作品
	阮升之		《揚州記》		劉《輯佚》，334	劉《輯佚》認爲南朝隋作品

上兩表中的「出處欄」前半部指書名，後半部數字指頁數。在「附註欄」中則是交代學者對於此一史籍的考證與相關作者、時間的推斷，後面的數字同樣爲出處的頁

前）——撰者とその内容——》，《東方學報（東京）》13 冊之一，頁 54。

數。至於簡稱如下：《隋志》＝《隋書·經籍志》、《唐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志》＝《新唐書·藝文志》、章《考證》＝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姚《考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劉《輯佚》＝劉偉毅《漢唐方志輯佚》、顧《後漢志》＝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姚《後漢志》＝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徐《補南北志》＝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張《方志》＝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⁴青山〈地方誌〉＝青山定雄〈六朝時代の地方誌について—撰者とその内容—〉。

以上總計郡書 8 種，地理書 44 種。由殘存的情況往回推估，當時對於地方制的撰寫可謂相當地踴躍。以下就從這些地方志觀察他們繼承了多少的吳越古史。

二、吳會地方志對吳越古史的傳承

關於吳會地方志對《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徵引，已有上一章唐代陸廣微《吳地記》之例，這是目前所見最早吳會地方志對兩書的徵引，也可推測魏晉南北朝的吳會地方志存在徵引的可能性。此外，即使並無直接徵引的證據，但是魏晉南北朝大量出現的吳會地方志，確實擔負起傳遞吳越古史的責任，在各個方面都有兼顧，說明了是一種撰寫吳越歷史的風潮。

就時間上來說，最早在晉代的《吳會分地記》和顧夷的《吳郡記》皆有記載：

《吳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則埋之。上生馬箠，勾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為馬箠，獻於吳。
5

《吳會分地記》曰：土城者，勾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羅山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傅母教之三年。
6

《吳地記》曰：（毗陵），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

⁴（清）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和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2冊，（清）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5冊，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台北：鼎文書局，1974年10月）。

⁵（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3月，據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宋本縮印）卷359〈兵部九十·鞭〉，頁8-9。

⁶《太平御覽》卷381〈人事部·美婦〉，頁3。

陵。⁷

《吳郡記》云：胥山，太湖繞〔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⁸

又虞預的《會稽典錄》，也有分別記載大量范蠡、計倪的史事：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⁹

越王近侵於強吳，遠愧於諸侯，乃脅諸臣而欲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而有功？」群臣未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而見而難使者？」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夫不能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官位財弊，王之所輕使；死者，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也，王豈難哉！」¹⁰

到了南朝宋時的董覽的《吳地記》、孔靈符的《會稽記》，以及南朝末期的夏侯曾先《會稽地志》也多所紀錄：

董覽《吳地記》曰：海渚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以禦越。後吳先主亦因此，更繕脩以備魏也。¹¹

董覽《吳地記》曰：（祭胥弔屈）夫差立，子胥以忠謇見亡，遂賜死，浮尸於江。夫差悔焉，與群臣於江設置祭壇，國人因為立廟。¹²

⁷ 《後漢書》卷 81〈獨行列傳〉李賢注引，頁 2673。

⁸ （宋）范成大撰，陸振岳校點，《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8 月），卷 48〈胥山〉，頁 636-637。

⁹ 《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史記正義》，頁 1741。

¹⁰ 《太平御覽》卷 469〈人事部一一〇·憂下〉，頁 2。

¹¹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二版），卷 24〈居處部·城郭〉，頁 566。

¹² 《初學記》卷 6〈地部中·江〉，頁 125。

孔曄《會稽記》曰：縣東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瀚紗石。¹³

孔靈符《會稽記》曰：陳音山。昔有善射者陳音，越王使簡士卒，習射於郊外，死因葬焉。今開冢壁悉畫作騎射之象，因以名山。¹⁴

夏侯曾先《會稽地志》云：吳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吳作成於浦東，以守越。以越在山絕水，乃贈之以鹽。越山頂有井，深不可測，廣二丈餘，中多魚，乃取一雙以報吳。吳知城中有水，遂解軍而去。¹⁵

夏侯曾先《地志》云：（長山）山高五十餘丈，其頂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南，范蠡壇，陶朱公廟。東，法樂寺。¹⁶

另外尚有賀循《會稽記》、張玄之《吳興山墟名》、劉道真《錢塘記》、山謙之《吳興記》等，就不再一一羅列。由此已可明知，至少兩晉南北朝的吳越古史記載存在著史不絕書的現象。甚至其他同類地方志也有著錄，可能只是佚失其中關於吳越古史的部分。多數後來成書的地理書，照樣追溯春秋戰國的吳越古史，這些方式還與宋代以後的地方志的形式有若干相似。不過其中除了虞預《會稽典錄》屬於郡書外，其他皆是地理書，因此在敘述古史上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就虞預《會稽典錄》所錄范蠡之傳，撰寫方式類似於正史的列傳，這與許多雜傳的敘述方式相同，也就是以人物作為媒介，描述傳主的生平以及其相關史事。至於多數的地理書，明顯的是以山川遺跡作為媒介敘述歷史，重點是地理本身，吳越歷史是用來說明此山川遺跡的歷史典故，或是名稱之由來。

虞預《會稽典錄》是吳會地方目前所見唯一有記載吳越古史的郡書，但就體例的繼承上來說，因為主要源自於正史的列傳，此與《吳越春秋》類似於正史的本紀略有不同，所以在《吳越春秋》無法詳細交代諸大臣的生平來歷，《會稽典錄》中或許就有所交代。不過特殊的是，

¹³ 《太平御覽》卷 47〈地部十二·土城山〉，頁 4。

¹⁴ 《太平御覽》卷 47〈地部十二·陳音山〉，頁 4。

¹⁵ （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台北：大化書局，據清·嘉慶 13 年刊本，1980 年 7 月），卷 1〈古城〉，頁 33。

¹⁶ 《嘉泰會稽志》卷 9〈山〉，頁 27。

其所記載的范蠡並非吳越之人，而是楚苑三戶人，這與許多「先賢傳」的記載方式略有不同。因為如較早的謝承《會稽先賢傳》而言，多記載東漢會稽郡當地的文人，如嚴遵、董昆為會稽餘姚人，陳業為會稽上虞人，¹⁷這相當符合當地人撰寫當地先賢的書法。所以即使范蠡聞名於越國之中，為越國史中的重要人物，但畢竟非越人出身。故可推知《會稽典錄》的記載並非從出身地作考量，而可能以吳越史為主幹，記載在吳越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

不過就地理書而言，其書寫的方式其實就很類似於《越絕書》中的〈外傳記吳地傳〉、〈外傳記地傳〉的書法，可能都是以條列的方式，分別記述各山川地理的來源，所以當代的地理概念是強烈的，大部分也就只留下典故。不過其中是否有如〈外傳記吳地傳〉和〈外傳記地傳〉兩篇之首，略為提到簡短的歷史呢？從殘存的引文觀之，答案或許是有的。在《吳會野記》中就有記載「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陰臨江之丘，名曰富陵。桐棺蘆椁，下千人之壇。禹得水土，故自海濱，臨大水也。」¹⁸另外，賀循《會稽記》也有「少康封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於此。」¹⁹

以上這兩段引文，皆不似說明某一山川景物遺跡的由來，而是說明越國的來源。從《吳會分地記》的引文可知，其作者仍然接受了大禹為越國始祖的《史記》觀點，故敘述大禹在會稽的活動。而後者賀循也說明了越國名稱的由來。這都是在對越國的起源作說明，可能都是擺在這部作品的首篇。尤其《吳會分地記》是吳郡分為三吳以後的作品，其中可能提及郡縣沿革的內容。這些都說明了在除了一一介紹各個山川景物遺跡之外，還是有簡要敘述整體歷史的可能性。

不過我們不能就推論這些魏晉南北朝的地理書，其寫作方式就一定來自於《越絕書》，因為當時許多地理書的撰寫方式都是如此。故寧可說是東漢地理書逐漸發展以來的共通寫作方式，《越絕書》此兩篇也可能是在此寫作潮流之中完成。如青山定雄對於六朝地方志的分析，其中

¹⁷ 魯迅輯，〈會稽郡故書雜集〉中所輯《會稽先賢傳》，收入《魯迅集錄古籍叢編》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頁238-240。

¹⁸ （唐）虞世南編纂，《北堂書鈔》（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廣陶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刻陶宗儀傳鈔宋本）卷92〈禮儀部十三·葬〉，頁8。收入《唐代四大類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頁389。

¹⁹ 《史記》卷41〈越王句踐世家〉，《史記正義》引，頁1739。

一個特色就是對於古代帝王的關係的記載，²⁰所以除上兩段引文之外，尚有：

張玄之《吳興山墟名》云：（杼山）昔夏后杼巡狩之所。今山上有古城曰避蛇城。²¹

孫詵《臨海記》：東刊山，山極高遠，蓋禹隨山刊木，因以為名。²²

孔靈符《會稽記》曰：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稱石匱。壁立千雲，有縣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²³

所以在晉南朝時期，不管是吳郡的張玄之，南渡的孫詵，會稽的孔靈符，不同的地域出身，在記述吳越歷史之時，基本上都保持著一致的態度，點出了大禹與此處的關聯。甚至孔靈符《會稽記》還記載了舜的歷史：「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²⁴這等於是將舜描述成當地人。但在《史記》中的記載，舜乃「冀州之人也。」又《史記正義》所引《永初山川記》中也有關於舜在蒲坂的記載。²⁵所以成書於唐初的《括地志》，才會對於舜出於何處的問題感到疑惑。²⁶因此《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中所缺載舜與吳越歷史之間的關聯，可說是這些地理書一方面繼承了古代帝王的傳說，還發展了其他的古代帝王的傳說。

此外，六朝地理書對於荒誕不經事件的記載，包括了神仙傳說、各種與龍類似的記載，也是一大特色。雖學者推論這與六朝時代思想的發

²⁰ 〈六朝時代の地方誌について——撰者とその内容——〉，頁 330-332。

²¹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4 月），卷 94〈烏程縣〉，頁 6。

²² 《輿地紀勝》卷 12〈台州〉，頁 18。

²³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1959 年中華書局影印南宋紹興刻本），卷 8〈山部下·會稽諸山〉，頁 4。收入《唐代四大類書》，頁 819。

²⁴ 《史記》卷 1〈五帝本紀〉，《史記正義》引《舊記》引孔靈符《會稽記》，頁 31

²⁵ 《史記》卷 1〈五帝本紀〉，「蒲坂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頁 32。

²⁶ 同上，「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頁 33。

展有關，包括了神仙思想、宗教思想的發達等等。²⁷然而其實就其內容而論，不乏是繼承《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而來。如《太平御覽》卷549〈屍〉引《吳會分地記》曰：

重山者，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郭外，後潮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乘漸水取以去。今山脇有缺處。²⁸

又《太平廣記》卷291〈伍子胥〉所引劉道真《錢塘記》同樣記載：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鮐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²⁹

前者承《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中的記載，後者則是在當地甚為流傳的民間傳說。故即使王充早在一世紀的批判，認為伍子胥與浪濤之說根本毫無關聯，但從三世紀到六世紀，在當地誰又真的理會呢？由此可知，在地理書中關於許多的當地傳說都被保留了下來，且往往是以「俗」的說法加以註明。換言之，固然書籍的流傳是行於文字的一種傳播媒介，本文主要依賴的也是此種傳播媒介的研究。不過正如許多史籍所記載的，這些史籍所承載的正是流傳在民間的傳說與信仰，這在廣大的民間社會中，傳說與信仰流傳的影響力應該是更勝過文字的傳播。因此此中史籍對於民間傳說信仰的傳承，其實也是根基於民間的傳統。若無此，士人恐怕未必能夠一代一代的傳抄下去。只不過歷史的研究必須依賴有形的文字或圖像等材料，淹沒在古代的口傳系統也只僅從此處稍微推測了解，本文畢竟無法處理這類範疇的問題。

另外，因為吳越古史還包括了對外國戰爭的歷史，所以雖不是吳會地方地理書，他處的地理書同樣著錄了關於吳越古史。如范汪《荊州記》

²⁷ 〈六朝時代の地方誌について——撰者とその内容——〉，頁334-339。

²⁸ 《太平御覽》卷549〈禮儀部二八·屍〉，頁3。

²⁹ （宋）李時等編，《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11月），卷291〈伍子胥〉，頁2315。

有記「宛有三女樓，作子胥宅。」³⁰史荃《武昌記》也記載「昔闔閭與伍子胥，屯眾於此山爲城，故曰闔閭山。」³¹此外，范蠡在越滅吳之後，因從事商業活動遊歷各國，所以許多地方志也都記載了他活動的痕跡。如盛弘之《荊州記》，「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塚。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于陶。」³²又不知何人所撰之《齊地記》，同樣記載「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間行，止於陶山，因號陶朱公焉。後改曰鴟夷山，在今平陰縣東。」³³

至於在吳越當地的郡書、地理書之外，還可以注意大區域地理書的撰寫。在西晉時期，原吳人張勃有撰寫吳國史《吳錄》，其中就有闢一章〈吳地理志〉。此應承襲《漢書·地理志》，其中記載了三國吳時期的地理面貌，也敘述了早期吳越地方的歷史。如大禹的歷史，「(茅山)，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故曰會稽。」³⁴與「伍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³⁵又到了南朝晚年，曾撰寫《建康地記》、《顧氏譜傳》的顧野王撰寫了南朝整個疆域的《輿地志》，同樣地記載了早期的吳越歷史。如記載了舜的傳說，「餘姚，舜後禾鹿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濮，上虞故縣。」³⁶又上一章所舉「子胥叛楚」一段文字，皆可知不限於吳會地方，包括全國性的地理書，也都吸收了原本記載於一地的早期歷史。

此外，吳越地方的豪族也對於撰寫家族歷史相當地熱衷，由此形成的史學體例有家傳和家史，在敘述家族姓氏的得姓由來或是遷徙過程中，往往就會追溯到漢初或戰國以前更早的時代。如何啓民曾指出吳郡四姓唯有顧氏爲當地人，其他四姓則是在漢代才陸續南遷。³⁷其根據就在於顧氏一族認爲其來源於句踐一脈，如編寫《文士傳》的張鷟，撰寫〈顧榮傳〉之時，即說明「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³⁸又唐代林寶的《元和姓纂》也引《顧氏譜》：「越

³⁰ 《藝文類聚》卷 64〈居處部·宅舍〉，頁 2。收入《唐代四大類書》，頁 1189。

³¹ 《太平御覽》卷 48〈地部·闔閭山〉，頁 2。

³² 《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7 月），卷 11〈登樓賦〉注，頁 490。

³³ 《太平御覽》卷 42〈地部·陶山〉，頁 10。

³⁴ 《史記》卷 130〈太史公自序〉，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張勃《吳錄》，頁 3294。

³⁵ 《史記》卷 66〈伍子胥列傳〉，裴駰《史記集解》引張勃《吳錄》，頁 2173。

³⁶ （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9 月），頁 187。

³⁷ 何啓民，〈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78 年 1 月），頁 80-84。

³⁸ （南朝宋）劉義慶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 9

王句踐七代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因氏焉。漢初居會稽。」³⁹此爲目前所見家族歷史撰寫直接牽涉吳越古史者，僅顧氏一例。然或許是因爲目前所存多爲北人南遷的家族史，故不見有類似的記載，但不能排除許多南方土著家族在撰寫家譜時，有著吳越古史記述的可能性。

總之，六朝的地方志與家史等史學作品因爲是透過大量的類書、註解才能夠保存下來，所以以上所舉的例子很可能都只是翎毛鳳爪，或許每部史籍都存在著對於吳越古史的追溯與記載。會做這樣的推論，也是因爲這些史學作品本身的寫作模式決定了對於吳越古史的敘述。

第二節 吳會地方史的體例與知識的轉變

在六朝地方志中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吳越古史的記載，這一方面可以說是新的史學體裁以不同的方式記載古代的歷史，這是一種繼承。相對地，也是吳越古史所記載的內容成爲可利用的資源，如上一章所言，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目的得到使用。故以下就分別對於這郡書、地理書、家譜的寫作方式作出分析，說明吳越古史與六朝地方志之間的關係。

一、吳會地方志的體例

關於郡書，是劉知幾所提出的概念，但在《隋書·經籍志》中是置於雜傳之中，因爲它們同樣是專門撰寫人物的史學體裁。只是郡書以州郡縣等地方空間爲範圍，專門記載一地的人物。而這其中的人物不限於當代，往往自古迄今，包含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其通常就以「先賢」或「耆舊」爲名，如《汝南先賢傳》、《徐州先賢傳》、《襄陽耆舊記》、《陳留耆舊傳》等，而在此中最完整且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常璩的《華陽國志》。就以《華陽國志》來說，雖然將人物傳記放置全書最後，而在之前已經敘述了蜀地的地理和古史以及偏霸政權的歷史過程，但人物也多包含兩漢，不僅是當代人。且《華陽國志》在敘述人物這方面的內容，大量參考當時著名由陳壽所作的《益部耆舊傳》，這說明了《華陽國志》關於人物傳記部分是此類郡書的代表。⁴⁰其中如在〈先賢士女總贊論〉

月)，上卷〈德行〉，頁 21。

³⁹（唐）林寶撰，岑仲勉校，《元和姓纂四校記》（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5 年 11 月再版），頁 788。

⁴⁰ 見《華陽國志圖補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0 月）卷 10〈賢士女總贊論〉，「故《耆舊》之篇，較美《史》、《漢》。而今志，州部區別，未可總而言之。」

中蜀郡的嚴君平、揚雄，〈廣漢士女〉中的楊宣、鄭純等人，都是西漢與東漢初年人。或就以魯迅所輯的《會稽郡故書雜集》為例，說明郡書中的寫作方式。如謝承的《會稽先賢傳》中，就提到東漢初年的嚴遵、董昆等人。⁴¹《會稽典錄》如前提過的甚至提到了春秋時代越國的范蠡、計倪，也包括了西漢的宋昌、鄭吉等人。⁴²

這都說明了郡書這樣的史學體裁，既然標榜「先賢」或「耆舊」，自然把當地歷來的先賢與耆舊都按照時間先後列入，直到作者撰述的當時。只有後來繼承「先賢」或「耆舊」的郡書，如「後賢」，是以「先賢」或「耆舊」等郡書的成書時間為起點，承接繼續收錄當地的士女名人。而此種郡書，才可能不提及該地早期的人物。如《會稽後賢傳記》目前所輯之佚文，皆可發現主要為兩晉人，包括了孔愉、孔羣、孔坦和丁潭等。⁴³

至於郡書採用如此的寫作方式的原因，目前包括了渡部武和遼耀東都已經指出與人物品評風氣和地域有密切的關係。渡部武認為「先賢」、「耆舊」等的郡書，其實就是一種「地方名士傳」，作者主要都是來自於地方豪族。故人物品評的風氣，其根基既然是漢代的鄉舉里選，隨著東漢長期藉由鄉舉里選所發展出來的地方豪族，進而在魏晉以後形成的九品官人法，就促使了郡書的大量產生。⁴⁴這是就內容的形成觀察郡書的出現。至於遼耀東則注意到創作郡書體裁的目的，其認為漢魏人物品評的風氣基於漢代的鄉舉里選，所以本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尤其漢末政治的分裂，也導致士族地域上的分化，互相比較。⁴⁵既然比較，本地「先賢」和「耆舊」於是成為重要的資產，也因此容易產生有「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至於他方，罕聞愛異」的情形。⁴⁶

用敢撰約其善，為之述讚，因自注解。甄其洪伐，尋事釋義，略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此外任乃強同時認為常璩除了參考陳壽《益部耆舊傳》之外，還包括了皇甫謐的《文士傳》等，再仿《三國志·楊戲傳》中〈季漢輔臣贊注〉成例而成。頁 521-523。

⁴¹ 《魯迅集錄古籍叢編》3 卷，頁 238-239。

⁴² 《魯迅集錄古籍叢編》3 卷，頁 244-246。

⁴³ 《魯迅集錄古籍叢編》3 卷，頁 300-301。

⁴⁴ 渡部武，〈「先賢伝」「耆旧伝」の流行と人物評論と関係について〉，頁 54-60。

⁴⁵ 遼耀東，〈魏晉別傳的時代性格〉，《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 年 2 月），頁 126-127。

⁴⁶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里仁書局，1993 年 6 月），卷 10〈雜述〉，頁 275。

關於六朝地理書的內容特色，青山定雄認為主要是記載了許多各式各樣的傳說，包括了古代帝王，對於自然現象的預知、動物以及仙人等的傳說。這些又與山川名稱的由來有所關係，故皆有所交代。相對地，賦稅與官方的資訊記載很少，故青山氏認為與其是作為政治上的參考，倒不如是說有深厚的學問涵養而對於地理文化的興趣所致。⁴⁷至於胡寶國則是將地理書稱為「州郡地志」，認為東漢魏晉時期主要的作品是「異物志」類型的地理書，但南朝以後，則轉變成「山川地志」。且指出這兩類地理書所出現的地理位置，主要都是南方。至於出現的原因，胡氏認為「異物志」可能來自於當時求異的風氣，至於「山川地志」則是與士族的經濟發展和寄情山水的思想有關。⁴⁸

由此看來，地理書雖然名為地理，但卻記載了相當多的人文事蹟，如古代帝王，包括了堯、舜、秦始皇等人，這一方面與《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相同，另方面舜的記載已見上述，也成為吳越地方在敘述吳越古史的內涵之一。不過就其目的而言，除了個人性情的抒發之外，本文也認為與郡書的目的類似，在於提高當地自然山川的地位與價值。如同劉知幾對於地理書的批評一般：「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⁴⁹尤其在許多山川中的記載出現古代帝王的遊歷，龍與蛟的出沒，或是仙人的修行，都是給予讀者此地山水的地靈人傑之感，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敘述此地山水過去的輝煌歷史。

至於家譜那就更不用多說了，其在政治與婚姻上的功用早由學者指出。只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政治的目的還更強烈。因為當時所盛行的選舉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看重一個人的出身，尤其是後來九品官人法愈朝向門閥主義發展時，所謂的「門地二品」，更重視出身而忽略德行與能力。⁵⁰另外，徐揚杰也認為中世士人大量修譜有品人、選官和通婚等三方面的作用，其實也說明了在維護家族發展的重要性。此外，徐氏也發現在內容上往往載有譜序，是用以專門敘述家族歷史，如得姓由來、始祖淵源、祖居地望和遷徙沿革等。⁵¹這就是上述顧氏家族在敘述家族歷

⁴⁷ 〈六朝時代の地方誌について——撰者とその内容——〉，頁 315-341。

⁴⁸ 胡寶國，〈州郡地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頁 159-185。

⁴⁹ 《史通通釋》卷 10〈雜述〉，頁 276。

⁵⁰ 多賀秋五郎，〈古譜の研究〉，《東洋史學論集 第四》（東京：不昧堂書店，1955 年 11 月），頁 52-54。

⁵¹ 徐揚杰，〈魏晉至唐代的中古譜牒略論〉，《家族制度與前期封建社會》（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71-120。

史時，會記載顧氏的來源過程中的一段文字。

故整理以上這三種史學體裁的寫作方式，可以發現郡書是因為會敘述當地古代以來的人物，因此會提到古代歷史；地理書則是記載許多傳說或是歷史；家譜則也會以譜序的方式記載簡易的家族來歷。由此說來，上述會提及那麼多關於記載吳越古史的例證也就不令人意外。且其餘的作品，只要是吳越當地的郡書和地理書，或是源於當地豪族的家族史，都會記載吳越古史的推論應該就是合理的推論。尤其是這樣的寫作方式在當時如此風行，想必制約了當時許多的史家。

而吳越地方志的繁多，又與豪族的增長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吳會兩地的郡書同樣集中在吳與兩晉時代，地理志則貫穿整個六朝，這都與當時的地方志發展概況相符。郡書的作者多是江東士族，包括了吳郡陸氏、會稽的謝氏、虞氏、孔氏等；地理書的作者背景則大量缺載，可能並非當時顯貴之人。即使有記載者也有非高門士族，如劉澄之為劉宋宗室，是彭城劉氏、孫詵則是北人，並沒有強大的宗族力量做後盾，故地理書的作者是由地方豪族或是許多非士族人物所撰寫的成分更高。這也反映了郡書因記載士族人物，與士族本身的發展有關，但地理書的發展卻與士族並沒有如此緊密的關係，這也與胡寶國討論「州郡地志」和「郡書」的差異點相吻合。⁵²另外在空間上，郡書普遍是以吳郡或會稽郡為敘述的範圍，只有在梁朝出現了以錢塘為主的《錢唐先賢傳》，地理書則到了南朝宋以後，就出現以新郡縣為單位的郡縣記。且梁以後，建康成為關注的對象，甚至有描寫建康城的都邑簿類地方志。換言之，隨著北人南下的聚集，以建康為中心的丹陽郡的地方志也在發展，長江沿岸南邊的京口一帶，都成為地方志撰寫的地點。

這表示著過去以吳郡吳縣和會稽山陰縣為中心發展的現象，進入了六朝以後，隨著各地農田水利的灌溉與發展以及人口的遷徙和聚集，使得各區域之間的落差以不像東漢以前如此之大。儘管吳郡和會稽郡仍是首要之地，但各地的豪族也紛紛成長，在六朝史中佔有一定的位置。⁵³而地域之間的人物、山川以及豪族本身的歷史也就自然都成為撰寫的對象。且即使地理書和家譜並不與士族那麼有直接的密切關聯，但也應該

⁵² 〈州郡地志〉，頁 181-185。

⁵³ 如大川富士夫曾針對吳興郡豪族在六朝的發展有專門的討論。見〈六朝前期の吳興郡の豪族——とくに武康の沈氏をめぐって——〉、〈南朝時期の吳興武康の沈氏について〉，均收入《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東京：雄山閣出版，1987 年 3 月），頁 142-201。

與具有一定勢力的地方豪族有關，畢竟學術集中於家門，沒有家族的發展也就沒有家族史可以撰寫。況且各地豪族的興起並非是整體面積的向外擴張，而是點與點之間的密度增加。那麼同樣處於吳越地方的各地豪族，在追溯吳越古史時，不也就會注意到吳越兩國的歷史嗎？此外，除了少數秦漢時代吳越地方的人物與事蹟之外，吳越兩國的歷史，古代聖王的傳說都是很好的取材內容，而這些都收錄在《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之中。

二、《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地方志中扮演的角色

綜上所論，不管是從史學的體裁方面觀察也好，從數量的湧現也好，都可以理解在吳越地方的郡書、地理書和家譜三種體裁，都會大量地參照了記載吳越古史的各種書籍，其中包括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從這個角度來說，《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可以說是這三種史學體裁出現之時的參考書之一，即使未必被採用，但從上述所引的各種證據來說，《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內容應被當時人所詳知的。既然《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會被當成參考書，會被當成撰寫新體裁史書所必備的書籍，那麼對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鑽研也就可以想見，甚至《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文字也會被定型與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適合後人閱讀與參照。

當然，不要忘了可以被參考的不只是《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而已。《國語》以及相關註解的通行，是對《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價值造成一定的限制。如上一章提到裴駢注《史記》時，其重視《國語》和韋昭、虞翻等人的注解價值並不下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說明同樣在敘述吳越古史的史料，或許在內容上《國語》並不如《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豐富與完整，但在價值上就難說是哪一方較佔優勢。同樣地，在吳會地方志的發展之中，因為《國語》與《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內容上有所重複，所以我們很難從地方志的幾個條文之中，就可以判斷這些作品所參考的是《國語》或《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不過，《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內容上與形式上還是佔有優勢。

首先，如上述提到，《越絕書》在地理方面的書寫方式是相似於後來地理書的書寫方式，儘管他們是此種記述方式同樣的產物，但書寫上的類似其實也就帶來的參考上的方便性。因為比起《吳越春秋》將地理的記述融入在歷史的記述當中，《越絕書》此中近乎羅列的記載方式，

儘管在書寫的層次上並不高明，但作為純粹的參考資料卻是相當方便。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越絕書》在成書之後，其有關於地理記載的部分，還可以單獨流通的緣故。而這也說明了《越絕書》對於日後的價值，在記載地理的部分極被後人所倚重。相對地，《吳越春秋》作為敘述整體吳越歷史興衰的史籍較為完備，若純粹就以記載的詳實度和完整性而言，《吳越春秋》比起《史記》和《國語》自然優秀了許多。或許正如魏徵和杜佑所批評的荒誕不經，但此種批評是在《越絕書》與《吳越春秋》已經極度流行之後才有的反應。且這樣的批評是放在魏晉南北朝許多史著中一併加以攻擊，表明了魏晉以降的史家並不排斥許多荒誕不經的說法，會影響《吳越春秋》的參考價值。⁵⁴

此外，從上面的舉例中可以發現除了提到舜的史料是今本《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無之外，其他的資料都可以在《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之中找到。而舜生於吳越地方的說法，如後文會討論般是攀附的可能性很大，這無疑說明兩書在敘述吳越古史時的價值。但相對地，《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作為後代地方志的參考價值上，其侷限仍是非常明顯。如前所述，吳會地方志的發展是在東漢末年以後，所以就內容所記而言，已經有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不包括在《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記載的吳越古史之中。這種情形在時代越後越更加明顯，地方志所要記載的時間幅度愈大，吳越古史所佔的篇幅只會日漸減少。即使《越絕書》有秦漢以後內容不斷地加入，但根據上一章的分析，這些內容其實不是很受到後人的重視，自然後代的地方志撰寫者，也不見得要參考《越絕書》。更重要的是，對於魏晉南北朝的地方志作者而言，秦漢以後的資料並不像春秋戰國以前的史料如此難得，有太多的資料可供參考，且史學日漸發達，在資料的獲取上只有更便利。因此，《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也只限於對吳越古史和相關典故上佔有優勢，其餘的部分，已不是《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記載所能提供的。

此外，地方志的發展有著與《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體例上的差異，這也是兩書所佔位置減少的關鍵。地方志的體例雖然不統一，但是簡單的歷史發展，山川地理景物，人物與風土民情等是必備的內容。

⁵⁴ 關於魏晉史家的志異傾向，可參考遼耀東，〈志異小說與魏晉史學〉，《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頁 221-252。

就《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能提供的內容，主要侷限在歷史的部份。至多在山川地理景物和人物與風土民情的部分，尚能補充其典故和神話傳說的由來，但都非常有限。如上一章所引，常出現的引文包括了虎邱山、歐冶子鑄劍、西施和范蠡、女墳湖等，這都是屬於自然景物和傳說。至於原本有些涉及吳越城池建築的地方志，儘管會提到《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但隨著吳縣、山陰城的不斷改建，《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能提供的訊息也就日漸消失。⁵⁵也只有大概以上幾個神話傳說，因為有民間風俗和地理景觀的長期存在，這些神話傳說才有流傳的基礎。

總之，《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內容與體例上，既保有優勢，但同樣也造成在參考上的限制。換句話說，對於吳越古史的內容上，以及寫作的體例上，都能對於後代的地方志撰寫提供了豐富的古代史背景。但是敘述時間愈近，在歷史的發展和體例的轉變下，《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能提供的訊息也就日漸縮減。宋晞就曾針對地方史與地方志的差異作過比較，曾指出三個方面的差異：（1）地方史以敘述歷史為主，求史、論的結合。地方志則以現狀為主，不作評論。（2）地方史以長期的人類活動為主，注重大事件的發展、轉變；地方志則對社會和自然現象並重，分門別類，面面俱到。故地方史用編年、紀傳和記事本末體，地方志則用書志體，且有掌故、文徵和叢談等體例。（3）地方史主要依賴文獻與考古資料，地方志則依靠調查、採訪等。⁵⁶就本本所著重的體例而論，宋氏所指出的前兩點，正好說明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與地方志的差異。可是，若我們更仔細的分析，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地方史與地方志的差異而已，《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是屬於地方史中的國別史或是政權史，是以敘述國家政權的興衰為主要脈絡。

此種國別史的體裁在當時並不多見，不過若注意到中國的南方邊疆地帶，倒是各地都有出現此類型的史學著作。除了在吳越地方是《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之外，在巴蜀還有《華陽國志》，至於在嶺南則有《南越志》。這四本書在《隋書》和《舊唐書》與《新唐書》的〈史部〉目錄中都可以見到。前二本的討論是本文的重點，《華陽國志》的研究

⁵⁵ 最明顯的例子是陸廣微《吳地記》中，在敘述闔閭城時，所述大小城之長度和規模都與《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不同。見（唐）陸廣微撰，曹林娣校注，《吳地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頁15。

⁵⁶ 宋晞，〈論地方志與地方史〉，《方志學研究論叢》（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5月修訂版），頁174。

也很多，以下略述《南越志》。

《南越志》的作者為沈懷遠，此人在《宋書·沈懷文傳》中有附其簡單事蹟，為沈懷文之弟。因王鸚鵡事件被徙自廣州，終宋世祖朝無法回到本鄉吳興。故其著《南越志》，應與其在廣州所待歲月有關。關於此書的內容，《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宋沈懷遠載三代至晉南越疆域事蹟。」⁵⁷根據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的考證，包括《水經注》、《文選》和《太平御覽》都曾徵引《南越志》，其中主要都是異物的記載。不過在《太平寰宇記》中，則包含了許多兩漢以來的事蹟，如趙佗、秦始皇、馬援、步騭等人的歷史事蹟，⁵⁸故可證《中興書目》所言不虛。

如此看來，則《南越志》雖無法以殘留的佚文正確得知其體例。但就其同時兼具南越歷史的敘述，同樣又有許多的異物記載，則《南越志》可能相當接近於《華陽國志》的體裁，或是說與《華陽國志》相同，同樣注重史與志的重要性。不像當時代地方志，主要偏重於志的一面，而是既包含古代政權的部分，也有後代地方史的性質，可說是兩者之間的過渡。不過由於撰寫動機的不同，《南越志》與《華陽國志》可能還是略有差異。

常璩本身是蜀人，在蜀地早有撰寫本地地方史的傳統。其撰寫《華陽國志》有其以巴蜀地方政權為主體的敘述方式，也為當時的成漢政權確立歷史的正當性。儘管，後來常璩入晉，立場有變，但整體的架構還是保留下來，讚揚巴蜀的悠久歷史，地靈人傑的態度不變。但是沈懷遠是武興沈氏，為江南豪族，其依據在廣州的經歷撰寫《南越志》，可能並非基於對南越的熱情。況且，滯留於廣州的時間裡，沈懷遠無不想盡辦法回到中央。先是阻止宗室內鬥而獲得原諒，逃過一死，但也直到前廢帝世才回到家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撰寫的《南越志》，在立場上與《華陽國志》應有很大的差別。⁵⁹

⁵⁷（宋）王應麟，《玉海》（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1月，依元後至元三年慶元路儒學刊本），卷16〈地理〉，頁3。

⁵⁸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頁21。在《太平寰宇記》所徵引的《南越志》看來，主要散見於〈嶺南道〉諸卷中，大多還是以山川異物的說明記載為多。這可能與《太平寰宇記》的體裁為方志有關，不重歷史，而重各方面的資訊，因此在引用《南越志》時，仍是以這方面的記載為主。

⁵⁹六朝時代的嶺南長期都被當地的豪族所控制，雖然中央政府有派官員進入，在劉宋以後對於嶺南的開發也更加積極，但嶺南地方官始終由家族世襲的情況並沒有改變。在此情況下，嶺南與中央的關係也就一直維持不同程度的衝突。官員出任嶺南，不是

無論如何，或許寫作出於不同的動機，但此種地方性的國別史論著，的確與漢代以來逐漸發展的地方志存在著差異。但過往學者往往合而論之。即使如宋晞指出兩者的差異，但也沒有指出地方史與地方志在史體轉變過程中的原因。以下，就嘗試著由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解釋著吳越地方史知識在魏晉之間發生變化的原因。

第三節 六朝政權的性質與吳越古史

一、孫吳政權的歷史基礎

如前所述，《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成書代表著在吳越地方對於在地史撰寫的成熟，也說明了當地學術界的發達。儘管這不是基於豪族的力量，但在當時，江東豪族力量的崛起的確是重要的歷史現象，之後於此地建立的孫氏政權依賴的就是這股力量。

三國的孫吳政權在三個政權的建立過程中是最晚的，直到西元 229 年孫權才正式擺脫對於魏國臣服的態度。因為這是第一次出現同時三個政權分立稱帝的情況，所以對於正統的追尋也就格外的重要。然而吳國既不像魏國佔據中原，受漢獻帝禪讓，也不像蜀國有漢朝皇室的血統，故在爭正統的依據上明顯的是薄弱許多。且魏的文化傳承，以及蜀的血緣繼承都隱含了歷史性。然而吳國從歷史之中看來，就只有春秋時代的吳越兩國的歷史是較為光榮的。因此吳國在政治正統的強調與自我認定上，對於春秋吳越歷史的利用就格外重要，也就是說，孫吳政權希望能夠援引吳越古史來說明吳國成立的正當性。⁶⁰

因為如第二章的分析，《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撰寫的主要內容是吳越兩國成霸業的歷史過程，雖然其中夾雜了不同的思想，以及對於個別人物的褒貶，但強調吳越兩國的崛起仍是很明顯的。尤其按李步嘉的說法，《越絕書》的成書是寄託在袁術與孫氏政權上，其強調伍子胥以及越國的霸業都是在暗示這兩個政權可以比起春秋時代的吳越兩

抱著貪污致富的心理，就是極欲脫身，較為正面的或是持著改善當地文化的心態。見胡守為，《嶺南古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93-206。

⁶⁰ 根據雷家驥曾對三國正統觀所進行的研究，認為魏國主要有地域說、遙繼說、漢有傳國之運說、五行相生說等，蜀國主要是血緣說、器物說、歷史地緣說，吳國則是器物說，五行相生說等。見《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 年 10 月）第六章〈政教力量的介入與天意、正統史觀的利用〉，頁 255-272。又吳國援引吳越歷史的部分是雷氏所未提及，而此方法與魏國的遙繼說其實是相同的。

國。⁶¹儘管李氏的說法主要是以文獻內部的考證與詮釋為主，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確是敘述吳越地方古代的光榮政權歷史，尤其是《越絕書》更是將君主與大臣都給予極高的評價，所以兩書在這方面的特性是不能忽略。從當時的政治行為上觀察，的確是將孫吳政權與古代的吳越兩國作出了比擬。

譬如曾有一次吳國使節陳化出使魏國時，面對吳魏對立的情形，便是追溯到周初的吳國，認為周朝之所以能夠打下天下是因為吳太伯能到東方穩固基業的原因。⁶²另外，到了吳國末年，甚至陸凱直把孫皓的行為比擬為夫差。⁶³更重要的是孫氏政權的先祖是孫武，是當年吳越爭霸中吳國之大將。除此之外，將孫權比之於句踐的情形也不在少數。在魏吳兩軍交戰時，蔣濟就曾將孫權比擬為句踐，勸魏明帝早日用兵。⁶⁴又陳壽對於孫權的評語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⁶⁵從中都可以隱約發現，三國的孫吳政權是以春秋時代的吳國自居，但同時也以句踐為標榜，不但上至君王，下至臣子都營造出此種氣氛。尤其更有趣的是多數會運用吳、越國故事的大臣基本上都有吳越或是南方的背景，不是當地人就是曾在當地作過地方官。⁶⁶可見自東漢以來吳越的歷史記憶在南方的確造成很不一樣的氛圍。

除了在對國家的正統爭勝與定位之外，為了撰寫吳國的歷史，對於古代吳越歷史的研讀與了解也就成為必要。身為撰寫吳國歷史主要人物的韋昭曾經註解過《國語》，如今我們在閱讀《國語》時還很依賴他的注釋。若閱讀〈吳語〉和〈越語〉，就可觀察他對於吳越古史的認識。在《國語·吳語》之中提到吳、越兩國的先世之時，韋昭認為「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鄭語〉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⁶⁷其中的說法並沒有中間的相關君王。此外對於句踐來自於芈姓似乎還特別引證

⁶¹ 李步嘉，《越絕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五章〈《越絕書》的成書時代與作者〉，頁289-302。

⁶²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裴松之注引韋昭《吳書》，頁1132。

⁶³ 《三國志》卷61〈吳書·陸凱傳〉，頁1405。

⁶⁴ 《三國志》卷14〈魏書·蔣濟傳〉，頁453。

⁶⁵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49。

⁶⁶ 如陳化、朱育、陸凱等人為吳越地方人士，王朗曾做過會稽太守，蔣濟是楚國人。

⁶⁷ （春秋）左丘明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卷19〈吳語〉，頁591。

據說明，甚為特別。這個說法，如第二章所提到，是存在於《史記》以外另一個強而有力的觀點，被韋昭加以採用。然相對地，《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載禹的後代的說法也就被否定，而認為與楚來自同源。於似乎，儘管在三國時代的韋昭，應該見過《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書，卻不採納其說。但其引證據說明，就顯示了《史記》的說法也有人支持，所以特別申辯，是一種對於句踐先祖來源爭論的展現。況且在注解其他國家君主時，即使提及其先祖，往往不引證，只是直接敘述。可見韋昭對於句踐的引證說明，的確是相當的特別。

此外，在韋昭為《國語》作集解時，參考了東漢以來的各家注釋。⁶⁸包括東漢的鄭眾、賈逵、王肅等人曾有章句，訓詁，以及到了漢末，吳國建立之初，虞翻、唐固也分別各有《春秋外傳國語注》一種。⁶⁹所以包括韋昭，在三世紀時，光是吳國就有三位注解《國語》的學者，這可能是先秦典籍中《國語》是少數記載吳越歷史較為詳細的史書，因此包含吳、越之間的爭霸，以及吳、越、楚等諸國等地的記載都備受到重視之故。⁷⁰另外在閱讀上，孫權曾勸呂蒙讀書的著名事件中，孫權也曾提到年輕時讀過《國語》，也建議呂蒙在歷史方面應該閱讀《左傳》、《國語》和三史，從中學習兵事。⁷¹因為漢末三國的亂局，的確可以比擬春秋戰國時代的群雄割據，後來的劉知幾就言：「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⁷²劉知幾將西晉初年司馬彪所撰《九州春秋》也歸於《國語》家中，表示了同時代許多學者也都紛紛意識到古今亂局之類似，所以在陳述諸國的紛亂現象時，《國語》的地位無意間也就被提高了許多。由此推斷，對於吳越古史的重視，很難想像他們會因此忽略了《越絕書》與《吳越春秋》。資料上的失載，可能是在於《越絕書》與《吳越春秋》在史書的經典位置上不比國史的《漢書》，也不比解經的《國語》，但不能因此認為《越絕書》與《吳越春秋》不受重視。

總之，吳國為了在正統方面爭勝與自我定位，將國家的歷史文化傳

⁶⁸ 同上。

⁶⁹ (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頁 34-35。收入《二十五史補編》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2 月），頁 3222-3223。

⁷⁰ 邱敏，《六朝史學》（南京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231。

⁷¹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 1274-1275。

⁷² 《史通通釋》卷 1〈六家〉，頁 15。

統連接到古代的吳越兩國。且爲了瞭解吳越古史，對於《國語》以及專門記載古代吳越古史的《越絕書》與《吳越春秋》都加以研讀。因此，即使沒有直接的史料說明除了在《國語》之外，當時的吳國君臣閱讀了哪一些史書，但因為孫吳政權的建立促使著對於吳越古史的需求提高，是難以否認的。而《國語》的多種注釋的出現，也就不就說明了試圖對於吳越古史要有個較爲正確與統一的認知嗎？

二、五朝政權的僑人格局

到了東晉以後，卻因為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使得對待吳越古史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

茲從東晉建國的過程開始討論起。在司馬睿南下之初，發生了三次重大的叛亂事件，分別是太安二年（303）的流民帥石冰，和永興二年（305）至永嘉元年（307）的陳敏，與永嘉四年（310）的江東豪強錢璦所領導的叛亂。但其結果，最後的勝利者都是江東士族，史稱「三定江南」。他們爲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以他們現有的社會力量平息了這三次動亂，維持了江東的安寧。儘管在這些動亂底下，江東士族並非總是遵奉著西晉正朔的名號。如在陳敏謀叛的過程中，還有許多江東士人加入其陣營，只是後來發現所託非人，才又脫離倒戈，重新結合江東士族的力量消滅陳敏。尤其是錢璦所領導的叛亂，正值司馬睿和王導的政權已初步形成之際，但反叛勢力吳興錢氏不但舉兵反晉，甚至擁立了孫皓之子孫充爲吳王，等於在名義上代表了吳國再起的意義。故可說充分運用對孫吳政權的歷史記憶，以號召江東大族勢力，在名義上與司馬睿陣營做對抗。儘管其結局是失敗的，且是敗在江東士族和司馬氏的合作之下，但是其意義已被彰顯。這也表現在司馬睿南來之初，江南皆流行著孫吳政權再起的歌謠，有「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和「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的種種說法。⁷³這是起於民間或是政治力的刻意塑造，在此無法考察，但無非也是孫吳政權的歷史記憶在運作，且此種氣氛或許影響著錢璦的起兵。

不過正如學者所言，錢璦的失敗，標示著江東大族對於西晉正統政權的靠攏。⁷⁴因此，孫吳政權再興的歷史意識也就旋起旋滅，取代的是

⁷³ 《宋書》卷 31〈五行志〉，頁 914。

⁷⁴ 《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頁 66。

對於西晉歷史的重新檢討。在晉史的撰寫之中，西晉一朝儘管討論甚多，但實際上並沒有施行。即使如陸機의 《晉紀》，也侷限於魏朝時期的三祖，可以想見的是隱諱多，且對於西晉滅亡的了解並沒有實質的幫助。東晉草創之初，在王導的主持之下，干寶即以第一任史官的身分出仕，開始撰寫晉史。⁷⁵且同一時間協助的尚有郭璞和王隱，使得這部《晉紀》日後得到了很高的聲譽。⁷⁶但在東晉初年其實不只一家撰寫西晉的歷史，包括了王隱、虞預、謝沈，甚至晚些時候的孫盛《晉陽秋》和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等都是東晉初年修晉史浪潮下的重要作品。

至於南朝諸政權雖然發跡於江南，但在追溯歷史方面，也往往有北渡僑人的歷史敘述方式。如在《宋書·武帝紀》中，稱劉裕爲彭城縣綏輿里人，追溯其祖先爲漢高祖帝楚元王交之後。而其祖先到了劉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⁷⁷《南齊書·高帝紀》中也提到「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也。」⁷⁸而梁朝開國者蕭衍與蕭道成爲同族，所以在歷史的追溯上也相同。至於陳霸先則是「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但其本「世居潁川。……永嘉南遷……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⁷⁹《南史》的記載雖然相同，但則直接寫明「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⁸⁰流露出陳霸先攀附早先士人的企圖，與實際上歷史追溯的困難。故從這點來看，南朝開國帝王都強調爲北方往南僑寓之人，而非江南本地人。甚至在國號的決定上，也都來自於在篡位之前的封爵，「宋」來自於「宋公」，「齊」來自於「齊公」，「梁」來自「梁公」，「陳」來自「陳公」，無一例外。雖尚有其他因素，⁸¹但可以明確肯定國號與吳越地方的古史沒有關連。這其中較爲例外的是陳朝，吳人和南方的土豪酋帥比起前朝都佔有更重

⁷⁵ 《晉書》卷 82〈干寶傳〉，頁 2149-2150。

⁷⁶ 同上，「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頁 2150。

⁷⁷ 《宋書》卷 1〈五帝紀〉，頁 1。

⁷⁸ 《南齊書》卷 1〈高帝紀〉，頁 1。

⁷⁹ 《陳書》卷 1〈高祖紀〉，頁 1。

⁸⁰ 《南史》卷 9〈陳武帝本紀〉，頁 257。

⁸¹ 關於王朝名號的來源，徐俊，《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名號探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1 月）一書有整理許多的說法。其中如引胡三省認爲宋的國號來自於春秋時代的宋國，陳來自於陳霸先之姓。至於齊的國號則與讖緯有關；梁的來源還包括蕭衍被封爲梁公時，齊封地就有豫州梁郡。頁 141-151。

要的政治地位。⁸²所以皇甫遵《吳越春秋傳》的創作正在此時，是否與政權性質有關？是否因為掌權者多為南人，而對於南方的早期歷史特別重視？這些都因為資料過少，無法準確說明兩者的必然性。但儘管如此，在陳朝朝廷中還是很禮遇過去的士族僑人，並不因此就完全捨棄僑人士族的優越價值。

總之，僑人士族的優越價值不只掌握了政權，也主導了文化上的價值。這不只展現在玄學的風氣，使得吳人爭相學習，也促使東晉南朝循華北中原的歷史為主軸，追尋華北中原的正統。因此對僑人而言，儘管偏安江南，這只是政治情勢上的不得不然。故政治對歷史撰寫的影響力主要還是在於國史的修撰。且在實際的政治型態上，五朝也有著與孫吳非常不同的性質。雖說孫氏與早期掌權者為江北人，但孫吳建國以後大權已逐漸落入江南人手中，⁸³東晉和南朝的政治權力核心在很長的時間之內都是由僑姓士族所把持。而這些僑姓士族倚仗北方的郡望，加上在文化上歧視南方人，態度上自然以北方中原為歸宿，江南之地只是一時之居。故在南朝的政治結構中，產生了很明確的階級劃分：僑人、吳姓與土著。⁸⁴

若將孫吳政權與東晉南朝政權相比，即可發現孫吳政權對於吳越古史的迫切性。因為孫吳立國是在皇帝制度底下產生天下分裂的態勢，這與春秋戰國時代仍尊周王為天子的情況有所不同。故對於孫吳政權來說，若缺乏歷史的根據作為正統的基礎是難以想像的。因此當時吳國的氛圍無不充滿對於古代吳越兩國的遙想，而這時《吳越春秋》已經成書，自然可以為其所用。《越絕書》在此時改寫的目的也在與國史的撰寫相互呼應，甚至孫吳政權滅亡之後，孫吳遺民對於孫吳政權的緬懷，一方面顯露在對《越絕書》續作上，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兩晉之間對於復孫吳之舊的殷殷期盼。不過東晉政權穩定之後以後並沒有對於此兩書在政治上的用途多所注意，自然不會促進兩書的再進一步地創造。且不可忽略地，《越絕書》與《吳越春秋》即使強調吳越兩國的霸業，但對於兩國

⁸²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3月），其中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和第四章〈土豪酋帥與陳政權的關係〉對此問題有深入的討論。頁73-149。

⁸³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月），第二章〈孫吳時期將東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動〉，頁19-58。

⁸⁴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頁33-101。

的起源皆來自中原的聖王先賢，這與南渡的政權與世族高門在意義上並不牴觸，自然也不會反對。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政治上缺少了實用性，但畢竟政權立足江南，僑人也在南方一代一代地繁衍，重視吳越地方早期的歷史又是另一股帶動對於吳越古史認識的動力。

第四節 江南豪族的發展與歷史意識

正如第三章已經提到，《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漢晉之間的成書，其實象徵了吳越地方知識群體發展的成熟。然而此知識群體成熟的背後，並不能完全與豪族社會或是經濟的成長畫上等號，儘管吳越古史的撰述大量集中於會稽的原因難明。

但這是否就能說豪族與《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呢？其實這可以從楊方的生平給予否定的答案。楊方此人並非士族，但卻與上述所提許多江東士族人物多有接觸。包括了當時的賀循、諸葛恢、虞預等人，都對楊方的才華大為稱讚。且賀循和虞預都在撰寫會稽郡書和地理書方面有所擅長，因此即使《晉書》傳中無載，但對於吳越古史的興趣應該也是楊方和賀循、虞預等人交遊的原因之一，或者是其結果。

故《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與地方志相同之處是同樣對吳越的歷史感到興趣而產生的作品，但不同之處在於目的和作者的背景。地方志的撰寫如上所述是對於本地人物、歷史和地理等的誇耀，是豪族在地方發達以後的史學反應，所以吳越地方的地方志的作者群很明顯的是由豪族所撰寫。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尤其在東晉以後，《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已經喪失了政治上的用途後，只剩下參考的價值。一方面豪族所要撰寫的是地方志，自然無暇重新撰寫《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反倒是因為參考的必要性，所以《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版本與字句就必須嚴格審訂。於是乎，楊方和皇甫遵的作品在此時的出現，可以說是滿足了豪族們在撰寫地方志時對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需求。

此種需求的產生以及《吳越春秋》從普通的地方史作品變成地方史參考的經典著作的過程背後，其實就蘊藏著社會結構的變動對於史學撰寫產生的變化。就漢晉以前《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產生來說，當時文人重視的是以吳越作為一個整體的古代歷史。雖然說在春秋時代分

爲兩國，可是自從越國消滅吳國以後，歷經楚國以及後來秦漢帝國的統治，直到漢代吳郡的分立，這個地方就一直被視爲一個整體。所以在寫作《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時，他們的思考應該就是站在緬懷或是追溯古代光榮事蹟的心情之上。但就東漢逐漸發展出來的地方豪族來說，這樣的歷史並非他們不在乎的，否則也就不會有那麼多後來的地方志，還是將歷史的淵源與吳越的古代史作成連結。只不過對於豪族來說，他們在地勢力的發展尤爲重要，再加上後來品評人物風潮的影響，以及九品官人法制度的出現，都逼使他們把焦點放在近代的人、事與山川地理上。豪族們一代一代努力撰寫新的地方志，所以有「先賢傳」，接著就是「後賢傳」。儘管吳越古史仍是必要的，但篇幅愈縮愈小。況且《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確在內容上和體例上都值得稱讚，豪族們又何必費神重新撰寫呢！

此外，不再對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進行重新的創造以及將兩書作爲參考的典範，這在歷史意識上來有另外一層意義，即是接受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歷史敘述，甚至是歷史價值。在這一方面反倒可以說是一種延續，對於吳越古代史的研究並沒有進一步的深化。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古代吳越地方的歷史起源，也就是越國來自於大禹的後裔，而吳國來自於吳太伯子孫的說法。這在後代廣泛地被接受當然不是因爲《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中所造成的現象，當《史記》流行之後，應該就有很多士人接受這樣的觀點。故反而因此，《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歷史觀點才不受到懷疑。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到，在追溯古代歷史時，出現了舜的歷史事蹟。從目前所見的文獻中，比較早記載舜是生於吳越地方的是周處的《風土記》。張守節在注《史記》卷1〈五帝本紀〉時，曾引《括地志》的說法：

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⁸⁵

⁸⁵ 《史記》卷1〈五帝本紀〉，《史記正義》引，頁31。

周處是三國吳晉時候的人，等於是《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都已經成書的時間點，卻在他的書中提出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中沒有的歷史敘述。箇中原因，對於古聖先賢的攀附動機非常地強烈。因為當晉朝以後士人一般普遍接受《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的觀點的同時，表示了他們對於歷史的研究關注在近代，而非古代，他們對於吳越古代史並沒有進一步的研究，且接受了《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成為經典的說法。但此時卻出現了舜生於上虞姚丘的說法，儘管在歷史敘述中並沒有與原先的歷史陳述有所衝突，但至少在《漢書》中也完全沒有這樣的說法。再加上此種說法的形成是依賴舜的姓氏而來，而將餘姚縣之名連接起關係。到了顧野王時，更有了餘姚縣乃是「舜後支庶所封之地」的記述，這與越國受封的來源幾乎一樣，且餘姚縣就在當時的會稽郡中。從這些跡象看來，人為攀附的情形很明顯。就算不是攀附，從當時地方志的書寫習慣來說，更可能是餘姚當地的士人所營造或刻意加強的說法，而後被訴諸於文字，逐漸廣為人所接受。

另一種延續就是《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中所呈現模糊的異族觀點，也同樣地不以為意地被保持下來。如第二章所述，《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中雖有出現承認吳越地方為蠻夷之地的說法，但因為不明顯，所以對後代的豪族來說，要加以延續並不會有太多的疙瘩。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吳郡顧氏，他們直接承襲了句踐的後裔，東甌閩君搖封子顧余侯而得的氏，這等於說他們是越人的後裔。但就以顧氏在孫吳政權以後的表現，完全不認為這樣的歷史記述有任何羞恥之處。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敘述中沒有強調作為異族的這一面，因為只有提到各世代的人物，其實也可以說是淡化異族的特性。但無論如何，提到「東甌閩君搖」卻無法讓人聯想到古代越人，這實在是不可思議。

再者，還可以再舉唐代的《吳地記》作為例子。在書的一開頭敘述當地的位置、郡縣沿革和賦稅後，就開始敘述吳國早期的歷史。其中從周太王敘述到季札之中，唯一有提到吳國是蠻夷的就是太伯和仲雍奔吳地以後「文身斷髮，示不可用」。⁸⁶此句是包括《史記》、《漢書》、《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都在使用的經典文句，也就是說制式的成分可能遠大於所要真正突顯乃是蠻夷的意義。至於其他的篇幅，都是以人名作為世系的連結。

⁸⁶ 《吳地記》，頁 6-8。

這也證明了，對當時的豪族來說，在簡述吳越古史時，與《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一樣都不太突顯異族的形象。他們多少忽略或淡化這樣的意象。即使要提，重要如關係到身分的血緣關係，也都能明目了然地在家族淵源上直接承襲而不在意。就更不用說在地方志中記述地理、歷史和人物等等，在用以說明典故時，會呈現出異族的意象了。因為在面對多數的歷史作品來說，他們很難否認過去的吳越歷史包含著蠻夷的形象。但畢竟這是遙遠的過去，即使承認此地過去的異族形象也無所謂，因為自吳越壯大之後不但異族形象日減，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能繼承的還包括了吳越兩國所建立起的霸業光榮，以及象徵當時繁榮的城樓建築，和當時人物活動的山川遺跡。因此，吳越古史中的異族意象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吳越古史對他們來說能夠提供多少的歷史知識與訊息，而對於他們的身分、文化等都不會因此可能包含著異族的形象而造成什麼影響。

至此為止，我們可以發現從漢代以來的吳越文士的史學創作軌跡。在最初他們撰寫《越絕書》是出於保留歷史的目的，因為這是一段對他們來說光榮的歷史。但也因此，《越絕書》的各篇章出現獨立創作的型態，使得《越絕書》類似一本吳越歷史的匯集本。在此之外，就有如趙曄，從事以當時流行的史學體裁書寫此段吳越歷史，因此《吳越春秋》的史學價值較高，時間順序脈絡分明。但因此必須犧牲一些內容，在資料的廣度上不如《越絕書》。儘管如此，《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都可說是全新創作，希望為了替吳越早期的歷史留下紀錄。因此從《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成書以後，對魏晉以後的士人來說，他們也就喪失了保存史料的動機。一方面《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流傳日廣，不怕再有散失的危險，另一方面過去的光榮既已為人所知，目標就成為在建立自身家族勢力的同時，如何聯繫過往的光榮。

這在史學發展的直接反應就是，在新的時代，他們放棄了原有的史學寫作方式。為了當代的利益，以及在當代思潮的影響之下，他們開始重新發展新的史學創作，關注新的史學課題。《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已經成為他們參考的資料，引用的書目，但他們不會再繼續複製這樣的寫作方式。只有為了閱讀便利，或為了參考上的價值，而進行適度的改寫或是出版。因此我們從魏晉以後的地方志觀察吳越古史，看不到對於吳越古史更深入的了解，愈來愈多的內容是後代的記載。這可說是後來的士人放棄了對於吳越古史的繼續專研。因就結果而論，地方起源的歷

史記憶並沒有因此被挖掘出來，不管是吳越古史或是家族歷史都還是來自於北方。因此，當《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建立了基本的吳越古史之後，六朝的吳越古史的撰寫與理解是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而非另起爐灶，有所新獲。

即使如此，他們卻不會放棄在他們的作品之中繼續沿用吳越古史。無論他們是否遺忘了本地起源的歷史發展，但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中原華北起源的過去，因為這畢竟是當地過去的光榮，甚至被他們自認為祖先的光榮。儘管如此的世系連結不見得可靠，且對於當代的士人來說，能夠影響地位變動和士人資格的因素是當代軒冕，而非橐中枯骨。故他們不會對於古史茲茲計較，甚至為了自抬身價而創造新的一段光榮過去。總之，吳越古史對他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裝飾性的宣稱，並沒有實質上的利益。雖說仍是一種象徵，但也僅只是一種象徵而已。